

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文艺学学科建设与创新

主编 傅修延



颜 敏◎著

破碎与重构：叠合的“中年写作”

——中国现当代文学散论

文集个体生命的年轮与专业的时代特质，竟然不期而遇地叠合在中年阶段。尽管这两者仅仅是一种偶遇，但提及这一点，大致可以勾勒出这本文集的个体写作状态和整体文化语境。

江西高校出版社



POSUI YU CHONGGOU DIEHE DE ZHONGNIAN XIEZUO
ZHONGGUO XIANDANGDAI WENXUE SANLUN

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文艺学科建设与创新
主编 傅修延



颜 敏◎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破碎与重构： 叠合的“中年写作”

——中国现当代文学散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破碎与重构:叠合的“中年写作”/颜敏著.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7.12

(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文艺学学科建设与创新/傅修延主编)

ISBN 978 - 7 - 81132 - 146 - 3

I. 破… II. 颜… III. ①现代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②当代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 第 194062 号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邮政编码	330046
电 话	(0791)8529392, 8504319
网 址	www.juacp.com
印 刷	南昌市印刷五厂
照 排	南昌市印刷五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50.375
字 数	123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32 - 146 - 3
定 价	12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超越苦难与拯救自我

——我的批评观念

颜 敏

相对于文学研究而言,我的文学批评起步较晚。我做批评的最初设想,只是试图在纯学术的“象牙之塔”与当代文学创作的“十字街头”之间找到一条贯通的路径,因此先治现代文学,再学当代文学。如今我深切地感到,批评可以使我所有的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创作问题发生关联,而研究又使我的文学批评有可能穿透感觉和印象的层面,获得比较厚实的意蕴。

尽管我的批评文字隐隐约约地显现个体思想情感的投影,但这种思想情感的意义还得经受时间的淘洗,况且,我毕竟还没有抵达尘埃落定、心境澄明的人生阶段,所以无意检视也无暇顾及它们。在表现自我、证明自我存在价值的欲望日趋平淡的中年,我更想追溯的倒是自己为什么选择文学这个专业,也许从这个初始的问题出发,才可能校正自己今后文学批评的思想标向。

我们这一代学人,大抵都有知青、工人的经历,我也如此。不过在我所从事过的职业里,最没有力不从心的感觉而又付出过最大的代价,获得过最多人生乐趣而又最为艰辛的,大概就是在高校从事文学教学和研究。这里既没有自诩高雅之意,也不存在职业上的等级观念,谁都知道,在这个红尘滚滚的年月,任何与金钱和权力无关的雅俗或贵贱,在世俗的观念中都是根本不值一提的虚幻而奢侈的精神自恋,我只是想说,自己喜欢在语言符号的世界里



漫游：读书、教书，行有余力写一些通常是自己愿意写的东西，亲身参与语言符号世界的构筑。

我最初的文学阅读始于童年，不过这种阅读主要是因为老师的诱导，多少带有一些被动的意味，而主动地进入文学世界则是在“文革”期间。我被突如其来的“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严酷现实惊呆了：“敌人”无所不在！我不知道这些“敌人”，尤其是身边熟悉的“敌人”的“罪恶”究竟有多大，但却亲眼目睹了他们作为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所表现出来的，足以令人精神惊悸的痛苦、惶恐、屈辱、自虐和绝望。坦率地说，我从根本上惧怕这个不断制造“敌人”、孳生“罪恶”的现实世界，并且本然地厌恶那些不断地无情指戳别人正在滴血的鲜嫩而疼痛的心灵创伤的人，但又茫然无助。完全可以想象，当一颗正在往外舒展的稚嫩心灵，被坚硬而粗糙的现实揉搓得伤痕累累的时候，除了用蜷缩起来的方式自我防卫之外，还能怎样？为了自我拯救，我遁入文学世界，这里有和风与阳光，更有令人感动的博大而又细腻的心怀，还有叫人百思不解的宁静、从容和自由。因此，我少年时代的一个美好梦想，就是做一个坐拥书城的图书管理员。从此，文学阅读伴我一生，成为我个体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然这也是我后来选择文学专业的隐密动机，还是我大学的专业学习学得轻松自如的根本原因。无论文学将来如何的衰退（这是很有可能的），我都会对它感恩终生，因为，如果没有文学世界的庇护，我真不知道那个时代会把我扭曲成怎样的人，真不能保证自己不会沉沦或堕落，也许永远不知道生命的乐趣与人生的意义。

或许是苦难记忆的痕迹过于深刻，或许是我所面临的本土文学本身就过于沉重，或许还有种种其他难以言说的原因，决定了我不能心无旁骛地坐在“象牙之塔”专事纯学术的文学研究，只要有可能，我都想以同代人的身份对当代文学进行精神质询。同时在这个因急剧转型而喧嚣骚动的历史时期，我并没有为将来的文学史提供一份指证的自信，关于当代文学批评的冲动与激情，从某种



意义上讲还是为了灵魂的自我拯救。

也许是人类本身致命的有限性的缘故,因此无论时代与社会怎样变换,人世间的不幸和社会的不公都会不同程度地存在。当我们置身于曾经梦寐以求的生活之中,才发现生活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同样当我们满怀激情地拥抱未来,或许最终可能也是两手空空。

对于不幸和不义,具有悲悯情怀的作家与批评家当然不会视而不见,但是关于超越苦难和自我拯救的思考却不尽相同。从五四文学的思想资源看,笼统地讲,最基本的思考路径有三种,一是社会心理与历史文化层面的鲁迅式的现实批判,二是人生哲理与宗教层面的许地山、冰心式的现实超越,三是审美层面的废名、沈从文式的现实梦幻。在新时期文学中,鲁迅的现实批判的方式是创作与批评的主流,而废名、沈从文的现实梦幻的方式仅仅体现在文学创作中,至于许地山、冰心式的现实超越的方式,无论是在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中都处于边缘状态。故此,普遍认同的文学批评往往是充斥着激愤和怨恨、沉重和尖锐,与此同时,鲁迅不断成为一些批评家精神懦弱和想象贫乏的失缺性心理补偿,激愤的批评似乎成为这个怨恨时代的精神末梢。

我十分崇敬鲁迅先生,也认同他的现实批判精神,但并不认为这是文学批评唯一的精神取向,许地山、冰心式的现实超越的方式和废名、沈从文式的现实审美的方式,同样是我们的精神资源。因为,我深知至少是自己缺乏鲁迅反抗内心虚无的坚强和抗争外在现实压力的勇力,不得不思考以怎样的方式并在多大的程度上践行鲁迅先生伟岸的人格精神。同时我也知道,彼岸的现实超越和现世的爱与美,在世俗化的社会是虚幻、纤细和脆弱的;但是至少迄今相信,它们在人类的内心世界却是充实、悠长和精致的,因为凡是人性未泯的人,心灵深处都有一块柔软的地方。

(原载《创作评谭》2002年第1期)

目 录

超越苦难与拯救自我

——我的批评观 /1

上编 作家作品论

张资平前期爱情小说论 /3

不可回归的自我放逐

——张资平中期爱情小说论 /20

艺术生命的自戕

——张资平的后期爱情小说论 /34

论鲁迅对张资平的批判 /43

“道路前面还是道路”

——析柔石《二月》主人公的回归与离去 /58

觉醒者的悲凉

——田汉《南归》中的感伤漂泊 /65

从自我危机到本体安全

——重读《青春之歌》 /82

文本的裂隙:解读《三家巷》 /98

“史诗性”与“英雄人物”:解读《红旗谱》 /115

历史记忆与英雄传奇

——“十七年”战争小说论 /122



“文革”的历史叙述

——论“样板戏”文学剧本 /140

反思文学的力作

——古华《芙蓉镇》研究 /155

苦难历程与精神定位

——张炜《家族》与《柏慧》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 /165

文化记忆的历史:《白鹿原》 /177

复调意味的历史思索:《旧址》 /190

“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痛苦

——论潘旭澜先生的《太平杂说》 /199

精神同代人的质询

——谈歌《城市热风》论片 /208

德性关怀与理性审视

——从《将军镇》看陈世旭的执著与变换 /216

生命的返顾与追寻

——读梁琴散文集《难以诉说》 /226

下编 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论

精神危机:革命文学的征兆 /233

晦暗的人性与不定的命运

——论新历史主义小说 /246

橄榄枝下“幸运”的一代

——谈“70后”的个人化写作 /259

20世纪90年代“最有影响的十部作品”二题 /267

宿命般的两难

——消费主义文化与文学分析 /278

底层文学叙事二题 /288

经典的含义和经典化问题 /303



复杂现实中的文化选择

——学院派批评的语境、含义及困境 /310

建构中的知识分子话语空间

——评三部中国当代文学史 /316

当代文艺思想流变中的五四 /331

苏区文艺：当代文学的滥觞

——从苏区文艺的特质析当代文学的源流 /349

关于左翼文艺思想的重新思考 /360

转换的标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382

新时期文学的人道主义思潮综论 /403

后记 /417



上编

作家作品论





张资平

前期爱情小说论

以往的文学史提及张资平的小说创作,一般分为两个阶段来评述,即前期五四新文学中的小说和后期日益通俗化的爱情小说。对其前期小说持一定限度的首肯,而对其后期小说则予以严正的斥责。本人认为,这种简约的归纳不能廓清张资平小说的本相。

我把张资平的小说创作划分为三个阶段。他的前期小说是指作者在日本和广东创作的,发表于1920年秋至1924年冬的小说。当然,用时空这确切明晰的界限,去硬性切割和规范文学作品不免过于僵硬——且不说作者创作思维的惯性,就是创作观念的更换期本身也是一个很难以时空来切割表现的模糊疆域。因此,本文的分期应该看作一个富有弹性的限定,作为特例的作品不受分期的严格制约,如写于1925年8月的《约伯之泪》,我就把它放在前期分析。

需要说明的是,张资平这个时期的小说内容上明显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爱情小说,一类是自叙传小说。但个别篇什,如《约檀河之水》,也兼及两类。本节集中论述他的爱情小说。

一、情节模式:爱情与婚姻的脱节

张资平1924年北上武昌之前,先后创作发表了《约檀河之水》(1920年)、《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1921年)、《木马》(1922年)、《爱之焦点》(1922年)、《双曲线与渐近线》(1922年)、《梅岭之春》(1924年)、《圣诞节前夜》(1924年)等短篇爱情小说。如



果我们把这些不同时空情境中创作的小说“外层皮肉”剔除，然后将它们的“情节骨骼”排列在一起，那么不难发觉，它们不仅同处于一个平面，而且同属一种类型：男女主人公在交往中相互倾慕，滋生出难分难舍的爱恋关系——爱情遇到重大的阻碍——自由恋爱不能发展成婚姻关系，留下刻骨铭心的精神创伤。这种情节模式，按张资平所采用的数学术语来阐释就是，相互爱慕的男女主人公在命运坐标上如同背道而驰的双曲线，无论爱情的渐近线怎样无限地接近双曲线，也永远不能接切，构成美满的姻缘。

在这种情节模式中，情节逻辑的关键在于导致爱情与婚姻脱节的障碍性因素。正是这些因素使小说情节由因（爱情）发展到果（不能形成婚姻），构成故事，并将小说的人物和事件从一般状态推到了较高级的状态，从而生成小说的意义，所以我以为分析这种情节模式中的障碍性因素，是切入小说世界和理解小说意义的最佳视角。

传统的伦理道德和文化习俗，是致使爱情与婚姻脱节的障碍性因素之一。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属于维护不平等的封建体制的社会思想、意识形态，其出发点是治人之道而不是人之道，是以禁欲主义和抑情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存天理，灭人欲”就集中地代表了它的根本思想原则。在这套被历代封建统治者视为与天理等值的道德规范面前，人的感性生命显得微不足道。这种扼杀天生丽质的人欲和人的感情的禁欲主义道德，体现在爱情婚姻上，就必然导致“礼教杀人”的悲剧。《梅岭之春》中的保瑛是位童养媳，在教会学校读书时，寄住在同族亲戚吉叔家中。吉叔的妻子逝世后，保瑛与吉叔萌生了爱情，俨然成了一对事实上的夫妇。但这种自主的爱情，在那些已经把传统的伦理道德内化成近乎本能的善恶观的人们眼中，成了伤风败俗之事。男女主人公无法抗衡周围道德舆论的压力，只有顺应与道德评价相联系的生存环境。最后保瑛违心地顺从了既定的社会角色的期望，回到



了没有任何吸引力的“丈夫”身边，吉叔也被迫远走他乡。

当然，传统的伦理道德更多的还不是作为一种直接的外在压力使人屈服的，而是以虚幻的价值掌握个体的意志，使个体丧失自我主体性而臣服在虚幻的光环下。《圣诞节前夜》中的韩蔚生和《双曲线与渐近线》中的郑均松，就是自身心理积淀着怪癖而陈腐的封建意识，扼杀了自然的人欲与情感。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被迫与初恋时的女友分手，当命运再次给予他们的机遇时，女友未忘昔日情意并希望他们敞开胸怀时，他们却因对方失去了“处女之贞”而熄灭了梦寐以求的自主婚姻的激情。韩蔚生不无痛苦地认为：“精神的贞操受损失后还有恢复的希望，唯有实质的，身的贞操一经蹂躏是无法恢复的。”^①郑均松面对哀诉衷肠的昔日恋人，内心爱的暖流不由自主地膨胀起来，但一想到对方已经丧失“处女美”，顿时冷静，拒绝了对方的请求。这种病态的贞操观，实质上是封建宗法社会为了维护家庭私有财产和巩固等级制度而强化的伦理意识，其残酷性就在于，它把女性的性价值置于女性作为人的价值之上。张资平的这几篇小说，揭示了传统的伦理道德与文化习俗，在历史的转折时期依然为人们普遍认同，依然隐匿在集体无意识中，它们在继续制造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的悲剧。

封建宗法制度和不平等的社会现实，是致使爱情与婚姻脱节的障碍性因素之二。人类自从进入封建社会，婚姻关系就被当然地作为人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这种关系有一种势力，并不源于本能，而是源于社会的压迫”^②。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及各类群拥有财富的不同，作为爱情的动力和内在本质的男女感性生命的因素，越来越被人的社会因素所排斥，婚姻逐渐成为对家族财产控制的一种方式，父母对其子女的婚事愈加关心和干预。中国传统社

① 张资平：《圣诞节前夜》，载《资平小说集》第1集第114页，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版。

② 马林诺夫斯基：《两性社会学》第190页，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



会的宗族势力对个人爱情婚姻的干预是理直气壮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被社会视为天经地义的婚姻程式，至于男女双方有无感情的基础则无关紧要。《梅岭之春》的保瑛就是包办婚姻的牺牲者。她自小就成为一户殷富人家的童养媳，情窦未开就失去了自由选择对象的权利。《约檀河之水》中的韦先生是中国留学生，他与日本房东之女芒儿在日常接触中结下了真挚的情意，并发展为情投意合的“有实无名的小夫妻”。但房东不愿女儿嫁给中国学生，而让她成为姨妈的养女，意欲许配给日本大学生。房东精心策划的女儿婚姻，强行地拆散了一对恩爱情人，实际上是一种带有种族歧视的变相的包办婚姻。作为婚姻当事人的男女双方，无非只是婚姻这一法律行为名义上的承担客体，他们本人无权自主地选择相伴终生的意中人。

如果说保瑛和芒儿是冷酷的宗法势力割断了她们用真实欲求和诚挚情意编织的婚姻红线的话，那么《爱之焦点》中的N和《圣诞节前夜》中的刘静仙，则是因为软弱而顺从异己的社会环境，违心地背叛自己的初衷而认同世俗的社会观念。曾经对着爱人誓言旦旦表白“我恨不得把我的心掏出来给你看”的N，在终身大事的抉择中，断然将最后决断的砝码，加置在“社会上的名誉和位置”的天平上，“硬着心肠”离开自己的恋人。^①她无奈地叹息心中“精神的愛”抵御不住“物质的欲”。从情理上讲，我们难以接受这种背弃自己宿愿的行为，但从现实上看又难以苛责她的抉择。因为爱情不可能永久地停驻在现时态的既有体验上，必须要与稳定的婚姻相联系。婚姻也不仅仅有两性的生理关系，不仅仅意味着两性间现时的愉悦，还包括两性的社会关系、物质生活水准、文化程度差异及信仰等等因素，还包括他们对将来孩子等的义务和责任。在传统的宗法社会中，女性有限的生存空间决定了她们的地位依

^① 张资平：《爱之焦点》第2页、第22页，上海泰东图书局1928年版。



附于男性。女性缺乏社会人格独立性的现实,使她们不得不以牺牲自身的自然健康的欲求和珍贵的情感为代价,去获取现实生活的相对稳定性。尽管五四个性解放的思潮召唤着知识青年,他们意识到:“没有爱的结婚是罪恶!爱全力支配的结婚是堕落!”^①但整个社会毕竟不能为这种代表着历史必然的现代情爱观提供现实基础,将男女自然健康的情感需求升华作为一种审美精神或道德生活的现实条件毕竟不成熟,这就导致了软弱的觉醒青年压抑着自己的情感和欲求,在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中缩回了迈向婚姻自由之路的脚步,就像N和刘静仙一样,把婚姻作为物质生活和社会地位的庇护所,而不是灵与肉一致的和谐港湾。故此,她们背弃初衷的根源,还在于不平等的现实社会。

从上述情节模式中的障碍性因素的剖析中可以看到,张资平早期的爱情小说在思想意义上具有积极的意义,其批判的对象是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宗法等级制度,而批判的思想根据主要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性主义。一方面,小说召唤人的自我意识。小说中的种种爱情悲剧向现代青年昭示,个体应该忠实于自身的感性生命,主体应把自我作为自足的精神实体,敢于蔑视“愚昧的义理”,无畏地追寻属于自己的幸福,而不要充当任何虚幻价值的祭品。另一方面,小说要个体正视客体自我,挣脱“迂腐社会的束缚”,^②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利,尤其怂恿女性鼓足勇气冲破世俗社会的罗网,摆脱社会各种限制自身幸福的束缚。尽管张资平小说中的人物,作为历史转型期的存在者,思想行为上具有种种传统文化的旧质,甚至不乏病态的癖习,但基本相似之处在于,他们把自身作为真实的独立的生命存在,而不是抽象的进行自我完善的个体存在。

① 张资平:《爱之焦点》第2页、第22页,上海泰东图书局1928年版。

② 张资平:《爱之焦点》第2页、第22页,上海泰东图书局1928年版。



从上述的小说还可以发现,作者宣扬的个性主义,面临着铜墙铁壁似的封建宗法势力和传统道德文化习俗,显示出异常软弱的特征。小说的主人公一方面蔑视他们生存的文化语境与烙上世俗功利痕迹的婚姻,另一方面又不可能将自己的爱情悬置于超现实的文化真空,因而他们往往流露出一自尊与自卑、激愤与无奈的复杂矛盾的心情。而且,从西方移植到中国的个性主义,与其生存的文化渊源和社会现实显然不太和谐,表现在小说中,就是人物过于迁就于情节而抑制他们的性格,有时让人觉得小说缺乏真实感。这与其说是小说上的毛病,毋宁说是个性主义在中国现实中显现的致命软弱性。

二、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及灵肉一致的爱情观

五四时代门户洞开八面来风,西方历时形成的学说和思潮在中国空间共时地发生着影响,关于人的意识,既有以自我为核心的个人主义,也有以平等、博爱、理性为圭臬的人道主义。张资平爱情小说在表现自我觉醒意旨的同时也强调人的觉醒,从而表露出比较浓原厚的人道主义意味。

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固然在某些方面相互联系,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思想范畴,而且各自本身都是一个发展衍化的历史概念。简言之,个性主义强调个体的自我意识,突出自我与自然、社会和他人的差异,从这种认知范式出发引申出个体的自主、独立和自由的要求。而人道主义的前身人文主义,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与神的对立中产生的,他们关注的是“‘人是什么’而不是‘我是谁’?”^①人道主义是从人的整体概念、人的本质出发,把个体作为人的一个平均数来看待。在这种认知范式上建立的人的意识,强调人的同一性,引申出人人平等,反权威、反特权,慈善博爱和同情弱者的倾向。由于人道主义经由的是近代科学炽盛的历史通道,

^① 科恩:《自我论》第180页,三联书店1987年版。